

17世纪来华耶稣会中国年报评介

董少新

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留下了大量中国传教区的年度报告,无论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天主教史研究,还是对于明清史、中国社会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这批档案文献尚未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简要阐述这批档案文献的内容、特点、规模和史料价值等问题,希望引起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

一 耶稣会年报制度

耶稣会的年报,又称为年信(葡文为Cartas Annuais,拉丁文为Litterae Annuae),是耶稣会独立的省级(Provincial)或副省级(Vice-Provincial)传教区每年呈给耶稣会总会长(Superior General)的关于教区整体情况的报告^①。耶稣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传播天主教。为了更有效地对派出会士加以管理,并增进会内凝聚力,耶稣会自创立之初,便重视下级会士对上级的定期汇报,从而逐步形成一套严格的通讯制度。

1547年7月,耶稣会总会长秘书、神父波朗科(Juan Alfonso de Polanco, 1517—1576)奉会长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之命,给其他耶稣会士写了一封信,信末抄录了尚未最后定稿的《分散在罗马以外地区的会员写信时应该遵守的规则》,对书信写作及其传递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书信分为“主体”(Principales)和“附件”(Hijuelas)两个部分,前者主要谈有助于品德教化的事例,后者则涉及传教士的缺点等秘密内容^②。不久后批准公布的《耶稣会会宪》,其中第673—676款涉及书信书写的重要性及相关规定^③。耶稣会于1565年6月召开第二次大会,决议第37项规定,将原每四个月一次的书信改为一年一次。此外,决议第54项对《耶稣会会宪》的相关规定作了补充修正,再次确定教化书信一年一次,由各传教驻院(Residencia或Casa)会长和地区区长上送交总会长;同时还颁布了被视为书信写作规范的《书式令》(Formula Scribendi),11月新任总会长波杰(Francis Borgia, 1510—1572)致信印度管区长夸多洛士(Antonio de Quadros),要求他在辖区内严格执行。至此,耶稣会年报制度基本形成^④。

耶稣会海外传教年报的编纂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首先,每年初,各传教驻院的耶稣会士草拟一份《传教纪要》(Pontos或Apontamentos),汇报上一年该传教区域的领洗入教者人数、主要发生的事件等信息。其次,所有这些《传教纪要》寄给由会长任命的一个专门的传教士,由其根据《传教纪要》编纂年报。年报完成后,寄送罗马耶稣会总长。为了确保年报寄达罗马,通常将每一份年报作数份抄本,通过不同渠道寄送,因此有时同一年报会有多份同时抄本留传下来。

耶稣会海外传教区有一套独立行政管理体制。第一批耶稣会士到达果阿后,便成立了耶稣会东印度省,管辖范围从莫桑比克一直延伸到日本。1581年,耶稣会成立日本副省,1588年日本副省脱离澳门教区。1583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玛窦(Mathieu Ricci, 1552—1610)在肇庆建立耶稣会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驻院。1604年,耶稣会中国内地传教区宣布独立于澳门,次

年,罗马建议澳门和中国内地脱离日本主教区,但因日本传教区提出抗议未果。1611年,日本成立耶稣会省。1615年,耶稣会总长阿夸维瓦(Claudio Aquaviva, 1543—1615)命令中国传教区独立于日本省而成为中国副省(Vice-Provincial),此命令在1618年得到实施,但这一问题在1619年再次被重新讨论,并于1623年最后确认。1623年3月23日,阳玛诺(Manuel Dias Junior, 1591—1659)成为耶稣会中国副省第一位真正的会长。

遵照耶稣会年报制度规定,这些省级和副省级传教区都需要向罗马耶稣会总部呈交年度报告。来自海外传教区的年报在16—18世纪欧洲各国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部分年报得以陆续出版,成为策划精心、目的明确、提供给教会内外人士的“大众读物”。除供印度及欧洲修院的修士们阅读以激励他们宗教信仰与传教热情外,其意图也在于提高耶稣会的政治声望,以此改善罗马教廷在宗教改革中的艰难处境。

二 耶稣会中国年报概况

关于耶稣会中国年报,最早对其专门研究的是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神父^⑤,他除了简单介绍了耶稣会年报制度及其文献价值和缺点外,还尽可能全面地罗列现存的中国副省年报以及具有年报性质的文献的目录。葡萄牙学者Araújo将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ia, 1592—1677)编纂的八份年报整理出版,并在序言中介绍了耶稣会年报的基本情况^⑥。美国学者夏伯嘉近年来对耶稣会中国年报也有所关注,举例指出年报记载与中国传世文献的互补关系^⑦。

在耶稣会中国副省成立以前,只有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i, 1565—1655)等来华耶稣会士所写的传教报告性质的书信,或者传教纪要;有关中国传教的内容,也常被收入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年报中。从1618年发生开始,有了正式的耶稣会中国年报,但由于耶稣会中国副省直到1623年才最终得到确认,因此这一年的年报被称为《1618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年报》^⑧。该年报除了“前言”外,还包括“中国目前的局势”、“耶稣会处境之概要”、“中国教会情况概要”、“杭州驻院”、“从杭州前往北京、河南传教”、“从杭州前往湖广、南京、广东传教”、“从杭州前往上海传教”、“嘉定驻院”等部分。由于1616年南京教案,四名传教士被逐至澳门,另一些传教士则隐藏于杭州和嘉定,所以这份年报仅包括这两个驻院的情况,同时传教士从这两个驻院秘密前往其他地方传教,其情况也记入该年报之中。《1618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年报》在形式上继承了以往耶稣会年报,同时也成为以后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的范本。

总体而言,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的结构一般固定不变,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中国世俗状况”(o estado secular do Reino),一是“传教状况”(o estado da Missão)。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中国(有时亦包括周边国家)发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该传教区最具特色的宗教与文化特点。如《1618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年报》描述了这一年发生的后金与明的“抚清之役”,记载了努尔哈赤发动攻明战争的原因^⑨;《1637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的第一部分题为“中国的政府、文字和军事概述”;又如瞿洗满(Simão da Cunha, 1590—1660)在其编纂的1651和1652年年报中,以一种悲伤的笔触描述了清军在福建省的屠杀,以及百姓逃跑时的混乱场景^⑩。年报的第二部分是主体,详细记载了领洗入教的人数、每个传教驻院传教士神父和修士的数量和名字、传教士在周边地区的传教旅行情况,有时也会对各驻院的自然地理、民俗宗教等情况加以介绍。许多年报中还包括了一些“特殊的和有教育意义的事例”,叙述一些人转变为天主教徒的原因、过程和结果。

耶稣会中国年报的存世情况十分复杂。有的系年报原本,有的年报仅存在抄本,有的则既存在原本也有抄本,且抄本不仅一个。有些抄本对原本进行了一些窜改。如《1644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

报》，原件保存于马德里王家历史学院图书馆，其抄本保存在里斯本的阿儒达图书馆（49-V-13， ff. 229-252），原本第726—726v页中讲到一位中国青年教徒，因为其未成年的妻子去世而悲伤地自杀了，但是描写此事的两个段落被划掉，并在旁边注明：“被划掉的内容不准抄录。”结果，在阿儒达图书馆的抄本中这两段被省略^①。自杀有违十诫，故教会有意将这类内容略而不谈。

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绝大多数以葡萄牙文写成，也有少量年报是用拉丁文、西班牙文写成的。其原件或抄件目前主要保存于阿儒达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②，其他如葡萄牙国家图书馆，马德里、巴黎等地的图书馆也都有一些收藏。笔者目前收集到的年报，主要来自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Jesuítas na Ásia）系列档案文献^③，均为17世纪的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共计约50份。1642—1647年间，鉴于当时政局不稳，耶稣会将中国副省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而年报也分为两份。

现存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的数量巨大，有数千页之多。这批档案文献不仅时间上大致涵盖了整个17世纪，空间上几乎包括了所有省份（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的两广、海南被划入耶稣会日本教省，因此有关这一区域的传教情况没有被记录在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之中，而需要参考日本教省的年报或相关资料），内容上除了传教情况外，也包括中国社会、政治、宗教、军事等方面，因此不仅是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宝贵史料，也是研究明清战争史、中国社会史等方面重要的西文中国史料^④。

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明清战争、杨光先教案、礼仪之争、教廷传信部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立及其对葡萄牙保教权的冲击，中国副省年报多不完整，甚至阙如。进入18世纪以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势力和实力大大超越葡萄牙保教权下的耶稣会士，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也随之终止了。外方会的传教士在华做了大量科学调查，不断有报告寄回法国^⑤。至18世纪中期以后，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汇编成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成为研究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主要文献^⑥。

三 耶稣会中国年报的史料价值

学界对耶稣会年报很少利用，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历史学者对此类档案文献的可靠性持谨慎态度。教会史家舒特（Joseph Franz Schutte）曾指出：“所谓年报，显然与传教长致印度管区长（事务性或保密性）的书信有很大不同，不过是在被许可的范围内讲述传教的形势而已。从实证性的报告这一点而言，它是完全真实的。但传教活动的真实背景、失败以及混乱，是不会提到的。”这是从治教会史的角度对耶稣会年报的评价。舒特还指出：“年报在欧洲被印刷前还要受到审查，经常可以看到用粗线条涂去的部分。这些年报不是依据原文，而是依据译文，公开之时更是全部如此。因此，这种年报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第一手史料，必须采用年报，只限于各驻院书信全部丧失的时候。”^⑦

尽管如此，舒特并未否定年报的史料价值。首先，年报中的内容并非杜撰，对于那些不适合公开的内容，只是避而不谈，但被记载下来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或者起码是有依据的。年报中记载的内容，大都为传教士自己的亲身观察所得，或者是来自中国教徒和中国文献记载，具有一定的一手文献性质。其次，年报的读者是欧洲人，而非中国人，因此这些被视为可公开的内容，也仅是对于欧洲人而言，其中有的内容也许并不适宜对中国人公开，因此可能包含着一些关键信息。第三，年报中讲述中国世俗情况的部分，以及描述各传教驻院情况的部分，对研究中国史十分有价值。作为长期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的观察有其独到之处，他们所记录下来的内容可能是对中国人而言司空见惯的事情或现象，因此往往为中国文献所忽略，而传教士对17世纪中国地方社会的观察尤其细致入微，所记载的内容往往不见于地方文献，因而对研究明清时期的地方社会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对研究中国信教人员具有重要价值。像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征这样

的著名天主教士大夫, 年报中有大量的记载, 而且与中文资料不同的是, 年报中的记载侧重于他们信仰天主教的虔诚表现, 两方面资料结合研究, 才能够完整揭示他们的历史面相^⑩。而有些中国教徒士大夫, 从中文资料中根本看不出其教徒身份, 但是年报中却有明确的记载, 如金声、邬明著^⑪。年报中提及中国教徒, 多称呼其洗名, 需要结合相关文献加以考证, 才有可能得知究系何人。但也有由于史料不足无法考证出其中文姓名之例。如在《1618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年报》中, 提到一个洗名为Thome的中国进士教徒, 在明军兵败抚清之战后, 朝廷将所有辽东官员撤职, 并任命一批新的官员进入辽东, Thome便是其中一员^⑫。但目前尚无法考证Thome身份。

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对于研究传教士在中国民间社会的传教活动亦十分重要。一般认为耶稣会士重视上层传教, 但通过年报资料发现, 他们并未忽视在下层百姓中的传教工作。美国学者Liam Brockey便利用了大量年报资料研究传教士在地方、民间的传教方式^⑬。笔者对传教士在中国民间的行医活动的研究, 也主要是以年报资料为依据的^⑭。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 可以通过年报资料来研究, 如《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手册》指出, 年报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妇女的描述, 如缠足、纳妾、妓女等, 并进一步指出, 利用此类资料研究中国妇女史, 仍是需要开展的课题^⑮。传教士对中国民间的各类信仰的记载, 以及这些信仰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 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年报中记录每年中国副省领洗入教的总人数, 在华西洋传教士神父和修士的人数和姓名, 每一个传教驻院入教人数和传教士人数, 新传教驻院的开辟, 原有传教驻院的失守, 传教区的组织结构与内部联系, 各种传教方式, 教友会的组织形式与功能, 中国教徒在信仰上的虔诚表现等等。这些都是治中国天主教史的基本信息, 但目前已有的中国天主教史论著, 大都没有使用这些资料, 导致中国天主教史研究还存在很多盲区。

每一份年报中都会记载大量的所谓“具有教化意义”的事例, 其中尤其以一些奇迹事件为多。如患病垂死之人领洗后立即获得痊愈, 传教士帮助村民驱鬼等。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就是此类记载很少出现在传教士依据年报编撰的编年史著作中。何大化在其《远方亚洲》(Asia Extrema)前言中说: “我不会调查或证实诸如奇迹、显灵、梦境之类的事情, 因为这不是作者所能做的, 而是归神圣的罗马天主教会来审查, 作为她的儿子, 我对她的审查结果完全遵照和服从。”^⑯这似乎说明, 部分传教士对此类记载持保留态度。若从社会史、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角度来看, 这些记载或不失为可供研究的材料。

明清鼎革是当时整个东亚乃至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相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以往中国学者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 都没有用到在华传教士用欧洲语文书写的各类记录。传教士的记载包括书信、年报、著述等, 数量可观, 且前后延续半个世纪, 具有完整性。这些资料大都源自在华传教士的个人观察, 或者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信息。部分传教士的相关著述已有中文译本^⑰供学界使用, 但年报中仍有大量相关信息至今未受到重视, 亦无中译本。

相较于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鲁日满(François Rougemont, 1624—1676)等耶稣会士有关明清战争的著述, 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所涵盖的时段更长, 内容更为全面, 也更为详细, 描述了很多细节和经过。从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正式入侵明朝开始, 至萨尔浒之战、宁远之战、徐光启练兵、己巳之变、吴桥兵变、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清军入关、南明政权的抗争、郑氏政权的反清复明及其最后失败等内容, 在耶稣会副省年报中都有大量描述, 且对满汉研究资料具有补充意义。

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对研究欧洲史、教会史也具有参考价值。包括年报在内的耶稣会书信, 向欧洲传递了丰富的异域信息, 有些报告在欧洲一版再版, 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受到了欧洲读者的欢迎。若对这些书信、报告在欧洲的出版、流传和引用情况加以仔细研究, 便可以大致了解包括中国在

内的海外知识在欧洲产生的影响。将耶稣会年报与其他书信比较,可以了解哪些内容对教会而言是可以公开的,哪些内容是秘密的。将已出版的年报与年报原稿比较,亦可发现哪些内容被删除,哪些内容被篡改,哪些内容被添加,从中亦可了解教会的禁忌。

17世纪的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至今没有一份被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反观日本学界,早已将耶稣会日本年报翻译注释并出版。考虑到学界能够直接使用年报资料者甚少,为了进一步发掘年报的史料价值,将其陆续翻译、注释并出版,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 ①关于耶稣会年报,参考(日)柳田利夫:《耶稣会年报制度》,(日)箭内健次主编:《锁国日本与国际交流》上卷,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关于耶稣会远东通讯制度,参见戚印平:《远东耶稣会的通信制度:以1587年丰臣秀吉传教士驱逐令的相关记述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第83—97页。
- ②转引自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40—441、446—447页。
- ③侯景文译:《耶稣会会宪》,台北光启出版社1967年版,第207—209页。
- ④Fernando Torres Londoño, 'Escrivendo Cartas. Jesuítas, Escrita e Missão no Século XVI', Revista Brasileira de História, São Paulo, v.22, n.º43(2002), pp.11-32.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第442页。
- ⑤Joseph Dehergne, S.I., 'Les Lettres Annuelles des Missions Jésuites de Chine au Temps des Ming (1581-1644)',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49 (1980), pp.379-392; Joseph Dehergne, S.I., 'Lettres annuelles et sources complémentaires des missions jésuites de Chine (Suit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51 (1982), pp.247-284.
- ⑥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A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ed.,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de Araújo. Macau: IPOR;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1998.
- ⑦夏伯嘉:《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复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0—18页。
- ⑧⑨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以下简称BA)藏耶稣会中国年报, Cod. 49-V-5, fls. 232v-264v, Cod. 49-V-5, fls. 233v-239.
- ⑩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 Cod. Jap.-Sin., 117, fl. 100.
- ⑪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A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introdução', p.16.
- ⑫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耶稣会中国年报,主要集中在Jap. -Sin. 50-63和113-122.
- ⑬关于这套耶稣会档案文献的具体情况,参见拙文:《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耶稣会士在亚洲〉评介》,《澳门研究》第30期(2005年),第197—207页。
- ⑭关于西文史料对研究中国史的意义,参见拙文:《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1期,第31—42页。
- ⑮关于17—19世纪法国在华调查的概况,参见毛传慧:《法国在华调查与“中国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西文文献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3—104页。
- ⑯(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I,大象出版社2001年、2005年版。
- ⑰此处转引自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第465—466页。
- ⑱钟鸣旦研究了不同史料中杨廷筠的不同形象,参见《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廷筠去世后,《1627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中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传记(BA, Cod. 49-V-6, fls. 490v-496v),这份史料值得进一步关注。本人结合年报资料,对徐光启的信仰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参见拙文:《论徐光启的信仰与政治理想——以南京教案为中心》,《史林》2012年第1期,第60—70页。前人对李之藻、王征、孙元化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使用年报中的大量资料,因此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⑲关于郭明著,参见董少新:《明末奉教天文学家郭明著事迹钩沉》,《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第125—141页。
- ⑳BA, Cod. 49-V-5, fl. 238.
- ㉑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㉒董少新著:《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92页。
- ㉓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393.
- ㉔António de Gouveia, Asia Extrema: entra nella a fé, promulga-se a Ley de Deus pe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Primeira Parte, Livro I,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 Volume I. Lisbon: Fundação Oriente., 1995, p. 186.
- ㉕例如(意)卫匡国《鞑靼战纪》已有几种中译本,其最新译本以及鲁日满等人的相关著作的中译本,见(西)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中华书局2008年版。

【项目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CZS019;《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助专项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GZZ05。

(作者董少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 哈恩忠)